



凤凰电影街

MON DERNIER SOUPIR

LUIS BUÑUEL

我的 最后叹息

[西] 路易斯·布努埃尔 —— 著
傅郁辰 孙海清 ——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MON
DERNIER
SOUPIR

LUIS BUÑUEL



凤凰电影街

我的
最后叹息

「西」路易斯·布努埃尔
傅郁辰 孙海清——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的最后叹息 / (西) 布努埃尔 (Buñuel, L.) 著 ;
傅郁辰, 孙海清译.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0. 6

书名原文: Mon Dernier Soupir

ISBN 978-7-80729-771-0

I. ①我… II. ①布… ②傅… ③孙… III. ①布努埃尔, B. (1900~1984) — 传记 IV. ①K835. 515. 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84635号

Mon dernier Soupir by Luis Buñuel

Copyright © Editions Robert Laffont, S.A., Paris, 1982,1994,2000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0 by Phoenix Publishing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09-270号

书 名 我的最后叹息

著 者 (西) 路易斯·布努埃尔

译 者 傅郁辰 孙海清

责任编辑 张叶青

设计制作 常言道文化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南六环磁各庄立交桥南)

开 本 630×960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771-0

定 价 38.00元

(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6)

中国 电 影 艺 术 研 究 中 心
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学经典丛书”

编委会

顾 问：赵 实 张丕民 童 刚 陈景亮 余秋雨 崔君衍 郑洞天
李少白 倪 震 张宏森 喇培康

主 编：傅红星

策 划：张建勇 饶曙光 李 迅 唐晨光

执行主编：张红军 单万里

副 主 编：李 洋 徐 枫 徐 辉 皇甫一川 章 明 田 静

编 委：艾 敏 陈育新 戴锦华 戴 宁 杜小真 傅郁辰 胡 克
靳文华 李道新 李二仕 连秀凤 刘桂清 孟 君 梅 峰

孙向辉 石 川 滕国强 田 颖 王东亮 王 珂 王文融

王 群 王琼琼 王晓民 王竹雅 吴冠平 吴 青 张献民

张文燕 张叶青 张宗伟 周健东 朱晓洁 朱怡力 赵卫防 杨远婴

(汉语拼音为序)

国际电影学术顾问

[英文字母为序]

Conseil International Cinéma Scientifique Invité

雅克·奥蒙 [AUMONT, JACQUES]	巴黎三大影视学院院长、教授；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院士；著名
雷蒙·贝卢尔 [BELLOUR, RAYMOND]	法国著名电影学家、巴黎三大教授，现任巴黎三大影视学院院长、法 会科学研究院院士
珍妮特·伯格斯特龙 [BERGSTROM, JANET]	美国加州大学戏剧电影电视学院教授、著名电影学者、女权主义电影
大卫·波德韦尔 [BORDWELL, DAVID]	国际著名电影理论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传播艺术系教授
弗朗切斯科·卡塞蒂 [CASETTI, FRANCESCO]	著名电影理论家、意大利米兰教会大学电影学教授、曾任巴黎三大和 教授
米歇尔·希翁 [CHION, MICHEL]	法国著名电影学家、电影声音研究专家
让-路易斯·科莫里 [COMOLLI, JEAN-LOUIS]	法国著名电影批评家、《电影手册》前主编、制作人、巴黎八大教授
玛丽·安·多恩 [DOANE, MARY ANN]	美国布朗大学现代文化与传播学教授、著名女权主义电影学者
斯蒂芬·希思 [HEATH, STEPHEN]	美国著名电影理论家、教授
格特鲁德·科赫 [KOCH, GERTRUD]	柏林自由大学戏剧学院的教授、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研究专家
E. 安·卡普兰 [KAPLAN, E. ANN]	美国纽约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著名女权主义研究家、电影学者
让-路易斯·勒特拉 [LEUTRAT, JEAN-LOUIS]	巴黎三大教授、法国著名电影史学家
苏珊娜·林德拉-吉格 [LIANDRAT-GUIGUES, SUZANNE]	法国里尔三大电影学教授、电影研究学者
科林·迈凯布 [MACCABE, COLIN]	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著名电影学家
托比·米勒 [MILLER, TOBY]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著名媒体与文化研究学者、电影学家
劳拉·穆尔维 [MULVEY, LAURA]	英国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电影与传媒系教授、著名女权主义电影研
托马斯·沙兹 [SCHATZ, THOMAS]	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广播电影学院教授、著名电影类型学研究专家
罗伯特·斯塔姆 [STAM, ROBERT]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国际著名电影学家
彼得·沃伦 [WOLLEN, PETER]	英国著名电影学者、作家，电影符号学研究家、加州大学电影系教授

献给让娜——我的妻子和伴侣

我不是作家，让-克洛德·卡里埃
在和我多次长谈之后，他忠实依照我同
他的谈话，协助我写出该书。

——路易斯·布努艾尔

目 录

001	一、记忆
006	二、中世纪的回忆
020	三、卡兰达的鼓
024	四、萨拉哥萨
038	五、孔齐塔的回忆
047	六、欢乐之地
060	七、马德里（1917—1925）
098	八、巴黎（1925—1929）
116	九、梦与梦幻
127	十、超现实主义（1929—1933）
162	十一、美国
176	十二、西班牙与法国（1931—1936）

189	十三、爱与恋情
195	十四、西班牙内战（1936—1939）
224	十五、无神论者感谢上帝
232	十六、重返美洲
246	十七、好莱坞，续篇与尾声
260	十八、墨西哥（1946—1961）
288	十九、赞成与反对
310	二十、西班牙——墨西哥——法国（1960—1977）
339	二十一、天鹅之歌

348	附录：路易斯·布努艾尔作品目录
-----	-----------------

一、记忆

我母亲在她生命的最后十年里，逐渐失去了记忆。有时，我去萨拉哥萨^[1]看望和我的弟弟们居住在一起的母亲。我们给她一本杂志，她就专心看起来，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然后我们把这本杂志拿走，再给她一本，其实仍是同一本，而她依旧怀着同样的兴趣一页接一页翻下去。

她最终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了，她不知道我们是谁，也不知道自己是何许人。我走进房间吻她，在她身边坐一会儿——在体质上我母亲是相当健康的，到了她这把年纪，她的行动也算灵活——然后我又出去，再回来。她仍以同样的微笑迎接我，邀我就座，好像是第一次见到我，而且不知道我的姓名。

我在萨拉哥萨上中学的时候，能背出哥特诸王的名字，每个欧洲国家的面积和人口，还有一大堆琐碎杂事。一般说来，

[1] 萨拉哥萨是西班牙著名古城。

在学校里，大家对这种机械的记忆练习持轻视态度，把那些做这种练习的人蔑称为记忆力强者。我记忆力很好，但是由于这样轻易地显示自己，得到的只是轻蔑。

然而随着岁月推移，曾被我们轻视过的记忆力愈来愈显得珍贵。不知不觉中，许多记忆不复存在了。某一天，我们会骤然地回忆一位朋友或亲属的姓名，但它却被遗忘了。有时我们会因为想不起一个我们曾熟知的词而感到极端痛苦，它就在嘴边，可就是抓不着它。

面对这种遗忘以及随后而来的更多的遗忘，我们开始明白并承认记忆力的重要性。健忘症——70年代以来我就开始遭受它的困扰——总是从忘记熟人的名字和刚刚经历过的事开始的：“我把五分钟前还拿着的打火机放在哪里了？”“开口之前，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所谓的前期健忘症；接踵而来的是前期逆向健忘症，它会影响到对最近的几个月、几年的记忆。“1980年5月我在马德里逗留期间住的那家旅馆叫什么？”“六个月前我十分感兴趣的那本书的书名是什么？”我都记不起来了。我拼命地思索但都枉然。最后到来的是逆向健忘症，它可以抹去人一生的记忆，就像出现在我母亲身上的症状。

我尚未体验到第三种遗忘症的袭扰。我仍保留着对遥远的过去，我的童年、青年时代的繁浩而清晰的记忆，还有众多的面孔和名字。如果有时我忘了某一个，我也不会为此过于担心，因为我知道通过冥冥中不停运转的潜意识的偶然作用，我

会在某个意外时刻重新回忆起来。

与此相反，当我不能回忆起一件刚刚经历的事，或一个在最近几个月刚认识的某个人的名字，甚至是一件物品的名称的时，我会感到极度不安甚至痛苦。我整个人在瞬间垮了下来。我不能够去想其他的事情，哪怕倾尽全力，怒火中烧也无济于事。这就是（记忆力）完全丧失的开端吗？须借助一番比喻才能表达出“一张桌子”这个词，真是令人难以忍受。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活着却不认识你自己，忘记自己是谁。

只有当记忆开始丧失，哪怕只是一点一点地丧失的时候，我们才能意识到全部的生活都是由记忆构成的。没有记忆的生活不算生活，正如没有表达力的智慧不能称之为智慧一样。记忆是我们的内聚力，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情感。失去它我们什么都不是。

我常常想在影片中加入这样一个场景，某个人想对朋友讲述一个故事，但他每说上几句就要忘记一句，而通常忘的都是最简单的词，如：汽车、街道、警察……这个人吞吞吐吐，含糊不清地说着，打着手势，搜肠刮肚地寻找着动听的同义词，直到那个朋友生气地给了他一巴掌并走开了。有时候为了用笑驱走自己对此的恐惧，我常讲一个故事。一个人去找心理医生，因为他记忆力丧失并出现了记忆空白。心理医生问了一些常规问题，然后对他说：

“好了，那些空白是怎么回事？”

“什么空白？”那人反问道。

记性是不可缺少的，它非凡奇特又弱不禁风，威胁它的不仅有它的老对手——遗忘，还有日复一日不断侵扰的错误记忆。例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向朋友们说起（在本书中也提及了）30年代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保罗·尼桑的婚礼。每讲一次我都仿佛看到了圣一日耳曼—德—普莱斯教堂，看到了人群，我也在其中。圣餐台、牧师以及让—保罗·萨特^[1]，新郎的证婚人。去年的一天，我忽然对自己说：这是绝不可能的！保罗·尼桑，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他的妻子，一个不可知论者家庭的女儿，绝不会在教堂举行婚礼。真是难以想象。这么说，是我把记忆转换了吗？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回忆吗？是一个错觉？是我把熟悉的教堂的框架安放到别人给我描述过的场面里了？我仍不清楚。

记忆不断被想象和梦幻侵扰，既然存在把想象误为现实的倾向，我们终难免把我们的假想制造成事实。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点仅有相对的重要性，因为这二者同样都是活跃的属于个人的东西。

在这本半自传性的书中，我也时常步入歧途，像在流浪汉小说^[2]中一样，任由一些意料之外的故事造成的难以抵制的诱惑牵着走，尽管我小心翼翼，可能仍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记忆存在。我重申，这一点是无关紧要的。我的错误和疑点同我所

[1]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法国存在主义代表人物，哲学家，文学家，196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2] 流浪汉小说是西班牙文学中最具特点的文学叙述类型之一，出现在称为“黄金世纪”的时期。

确信的东西一样，是我本身的构成部分。我不是历史学家，无书本笔记借以为考，不管怎样，我的叙述是我本人的，带有我的信念、我的踌躇，重复以及空缺，带有我的真话和谎言，总之，这就是我的记忆。

二、中世纪的回忆

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才第一次离开阿拉贡^[1]。因为我们家的一些朋友邀请我到他们那里做客，他们当时正在靠近桑坦德的维加·德·巴斯度夏。在穿越巴斯克地区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了一片崭新的、意想不到、迷人的景色，与我在此之前所见过的风景完全不同。我看到了彩云、霏雨、雾气腾腾的森林，还有石上湿漉漉的苔藓……这种美妙悦人的印象一直延续不断。我则酷爱北方，是严寒冰雪和山中风暴的宠儿。

下阿拉贡的土地十分肥沃，但是极为干燥，尘土飞扬。有时一两年里也看不到云团在冷漠的天空汇聚。偶尔，有一块大胆的积云从山背后探出身来，这时候开食品店的邻居就要来敲我家的门。我家屋顶上有个尖型的小了望台，他们爬上去观望云团缓慢的飘移达几个小时，然后摇头悲叹：

“刮的是南风，云要飘远了。”

[1] 阿拉贡位于西班牙东北部地区，它包括三个省。

他们说得有理，那块云彩果真一滴雨都没下就飘远了。

有一年苦旱，卡斯德塞拉邻村的居民们由神父带领，组织了一场祈雨降恩的仪式，那一天，乌云在村子上空点点滴滴地洒了点儿雨水，看来祈雨几乎毫无用处。

更糟糕的是，祈雨尚未结束，乌云已尽消散，酷日当空普照。

几个村都有的那种鲁莽汉子拎起队伍前面的圣母像，在经过一座桥时，把圣母像扔到了瓜达卢佩河里。

可以说，我出生（1900年2月22日）的村镇一直处于中世纪状态，这种情况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是一个孤立静止的社会，阶级划分的标记明显。劳动者对于上层人士及地主的尊敬与驯服代代相传，扎根于传统的习俗之中，看起来是坚不可摧的。平缓单调的生活日复一日，比拉尔教堂的大钟具有组织和指导生活的绝对权威。大钟宣布宗教仪式开始（弥撒、夕祷、奉告祈祷），以死亡钟声和弥留钟声告知日常生活中的不幸事件。如果一位村民将要归天，大钟即为他发出沉重的哀鸣：对与死亡作最后抗争的成年人敲响的是大钟，声音深沉、肃穆；为弥留之际的孩子敲响的是一个比较轻的铜钟。不管是在田野里，还是在大路上，街道中，人们会驻足寻问“谁要升天了？”

我还记得火灾发生时的警钟声，以及盛大节日期间做礼拜时的宏亮钟鸣。

卡兰达的居民人数不足五千。这座特鲁埃尔省的大村镇距

阿尔卡尼斯十八公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供给匆匆过往的旅客。火车把我们 from 萨拉哥萨带到阿尔卡尼斯。车站上有三辆马车等着我们。最大的那辆马车叫“花园女工”，后面是“战船”，这是一种封闭式的马车，最后一辆是双轮的小马车。由于我们家人口多，还带着行李，并有佣人跟随，所以虽是三辆马车也坐得满满当当。我们用了近三个小时走完十八公里的路程，到达卡兰达，头顶炎炎烈日，不过我不记得有哪一分钟让我感到索然无味。

除了在比拉尔节和九月节，卡兰达很少来外乡人。每天大约十二点半的时候会来一辆由两匹骡子拉着的从马甘来的驿车，车后尘土飞扬。这辆车带来邮件并不时地带来流动贩货的客商。直到 1919 年，这个村里才有了第一辆汽车。

这位买车的人叫堂·路易斯·冈萨雷斯，他开明、现代，甚至还是个反教权者。他的母亲堂娜·特立尼达德是一位将军的遗孀，来自塞维利亚一个贵族家庭。这位显赫的夫人由于仆人们的不慎轻言吃了些苦头。事情是这样的，夫人为了自己沐浴方便，使用了与众不同的洗浴设备，它呈吉他形，设计豪华。而卡兰达上流社会的名媛淑女据此认为特立尼达德夫人有伤风化，长久以来不和她讲话。

当葡萄害虫大肆侵袭葡萄园的时候，这位堂·路易斯采取了一个重大行动。当时，葡萄秧无望地死掉，而农民们拒绝像全欧洲做的那样，把葡萄秧拔掉，改栽美国的葡萄秧。一位专程从特鲁埃尔赶来的农艺师在镇办公大厅安放了一台显微镜，为